

[当代评论]

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

邓玉久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1)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 和谐; 悲剧意蕴; 关系

摘要: 汪曾祺小说中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作者追求传统文化中和之美的审美要求;同时作家的人道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意蕴”;分析其作品中“和谐”与“悲剧意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8)04-114-03

Analysis of Aesthetic Features in Wang Zengqi's Novels

Deng Yujia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1)

Key words: Wang Zengqi's novels; harmony; tragedy implication; relation

Abstract: The tranquil, warm and harmonious beauty in Wang Zengqi's Novels manifests his efforts to pursue the aesthetic demands of harmonious beauty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eanwhile, it is the author's humanity mood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from real life that has made his novels present a sense of tragedy implication. Apart from that, it will help to completely comprehend the aesthetic features in Wang Zengqi's Novel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harmony and tragedy implication.

汪曾祺是衔接现、当代的著名作家。对于其小说的审美风格,汪曾祺曾这样说过:“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确实,在他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与纷争,追求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但是如果全面考察汪曾祺的小说,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对悲苦、冷酷、凄凉人生的揭示。他的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谐而完美的世界。在汪曾祺刻意营造的和谐外表下总是潜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读者在阅读时一面感受着作品中田园牧歌式的美,一面又体味着作者营造出来的悲哀意境和悲悯天下的美学气质。

《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是患难之交。在靳彝甫身处困境时,王瘦吾和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落得家徒四壁时,靳彝甫变卖了祖传的三块“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的珍贵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三位清贫之人的动人情谊,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那么温暖感人。然而,感动的刹那,我们又会为他们的苦

难人生叹息。这三个人都是卑微、安分守己的,但王瘦吾最后破产落得一贫如洗,陶虎臣甚至不得已以20元将亲生女儿卖给一个驻军连长。类似的作品还有《徙》,谈壁渔和高北溟师生情深,高北溟受业时,谈壁渔不收他的修金,在学生师满后,谈壁渔又将别人求他的文字、碑文墓志、寿序挽联都推给高北溟,让他靠润笔所得以养家糊口。谈壁渔去世后,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并不惜牺牲爱女白雪的前途。在自己都很艰辛的窘境中,还时时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谈壁渔和高北溟身上体现出读书人的正直善良和多情重义的品质。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也体现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高北溟的命运也是悲怆的,工作屡受挫折,女儿白雪年纪轻轻就香销魂散。我们在感动于他们仁人君子的热肠、博大的仁爱之心以及他们的多情重义时,又会有着一种叹息和遗憾。这就是汪曾祺小说中“和谐”与“悲剧意蕴”共存给出的效果。

就整个创作而言,汪曾祺以和谐为主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受戒》描写的是小和尚明海和天真浪漫的农村小

〔收稿日期〕: 2008-04-05

〔作者简介〕: 邓玉久(1965-)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姑娘小英子之间真纯的友谊和诚朴朦胧的爱情。里面的景美,情美,人美,宛如清澈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美得一尘不染,它也是汪曾祺最初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作品。《鉴赏家》中,季匍民是被称为全县第一的大画家,却与果贩叶三成为好友。季匍民极度厌恶世俗的虚伪和无聊的应酬,每天只是关门作画,画墨荷,画莲蓬。他不与别人谈画不许他人进入他的书房,却允许叶三自由出入,并看他作画。而叶三竟能真正看懂季匍民的画,往往叶三称赞的地方正是季的得意之笔。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的“知音”传说,写的是淳朴、毫无功利色彩的友情。他们宽和、旷达的生命意识充满了诗意的恬静,人生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实在的和谐美。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片安宁与和谐,有很多悲剧意蕴是较浓的。《露水》中的那个女人,丈夫死后又死了儿子。后来靠上一个唱扬州小调的男人,满以为从此能“常在河堤上坐坐,看看星,看看水,看看夜渔船上的灯,听听下雨样的虫声。”可他们仅仅“在一起一个月,露水丈夫就得了绞肠痧,”折腾了一夜也死了,女人悲天抢地号啕大哭,却怎么也不能改变再一次丧偶的命运。《晚饭花·珠子灯》全篇更是弥漫了彻骨的悲凉。孙小姐丈夫不幸重病死了,死前留下遗言“不要守节”。孙小姐虽然也读过林译小说《茶花女遗事》,也听从丈夫的劝告放了脚,但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恪守的是封建礼教和贞操观。然而她的人性却扭曲了,从此“她变的有些古怪了”“爱洁成癖的孙小姐屋里,茶杯上落了细细的尘土”,“她就这样躺了十年,郁闷而死。”这样力透纸背的描写,不仅是对孙小姐青春毁灭的悲叹和惋惜,更是对封建传统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控诉。

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汪曾祺叙说的是一些凡人凡事,叙说的是一种和谐一种温馨,而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悲剧意识始终穿行于他的笔下。如果只看到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或者只看到他笔下的悲剧意蕴都是不全面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和谐与悲剧意蕴是的确确是共存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读来才更加意味悠长,内涵深远,滋味醇厚。

在汪曾祺小说中它们不仅共同存在,而且作者运用营造优美意境和留白的方法来使这两种审美追求融和在一起,这与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是分不开的。汪曾祺有艺术变形的本事,尽管有时候上演的是一出悲剧,他却能通过营造优美意境,努力给悲剧抹上朦胧的色彩,使生活诗意化。《大淖纪事》事实上叙说的一个爱情悲剧,美丽的姑娘巧云与小锡匠十一子心心相印,可恶势力代表刘号长却乘着某个黑夜玷污了巧云,而巧云依然热恋着十一子,以致十一子惨遭刘号长一伙的毒手,几乎被打死。巧云费尽力气,才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十一子。男女主人公经历的是生与死的考验,汪曾祺却将这样一个带着血与泪的

凄美故事溶于诗情画意的环境中,放在一个不用传统观念去约束和评价人的“大淖”这个地方。正是因为这样,故事的悲剧性就减弱了,所有的遗憾和惆怅以及悲天悯人对他们的爱情都是一种亵渎,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乎一些所谓的“贞操”,依然真诚地笑,真情地吻,他们是真正出淤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在描写昔日独特的手工业消逝时,汪曾祺把劳作过程写得如诗般优美。“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吟唱,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瓢,有白的、有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最后一个车匠都将消失,本是一种遗憾,作者却在优美的叙述中企图减轻留恋的苦涩。作者通过营造优美意境,让人觉得生活的悲剧并不那么可怕了,灰色黯淡的人生也会有柔和的金光。悲剧意蕴也笼罩在柔和的金光之内,让旁观者觉得悲剧意蕴也成柔婉的了。

留白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技巧。汪曾祺把绘画中的留白用到小说中来了,他说:“要留有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考、去补充。”还说:“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能不说的话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大了,传达的信息就多了。”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对于其小说中的悲剧,他有所言有所不言,即使有着最深最浓的悲剧意蕴也有待读者感受和挖掘。《异秉》的结尾就是一处精彩的留白。作者在写到大家听到王二的“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之后,是这样结尾的:“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大小解的时候。”看到这里,读者可能要寻思半天才大笑,大笑过后又对他们产生悲悯之心。《兽医》中的顺子妈“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大红剪绒喜字,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上一双锈了秋海棠的新鞋,除了孝。”从一场丧事走上喜事时,顺子妈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一切都是空白,我们只能自己去感受和体味。小说的留白,乍眼初看似乎少了冷漠多了温润,事实上,越是节制不说,我们就越感到悲哀的力度,悲剧意蕴就越浓重。

营造优美意境主要是能够冲淡悲剧意蕴的浓度。因为悲剧如果过于强烈,必会破坏其和谐。留白的作用则是为了让读者对生活的某些部分进行“重构”,让人可以感受到作品中的深层意蕴。两种手段的运用使他的作品在和谐之中飘荡着悲剧意蕴,而悲剧意蕴表现出来的又非悲观主义,相反有一种柔性、乐观的氛围。

汪曾祺小说中和谐美与悲剧意蕴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反衬。作者总是将悲剧放在背景的位置上,笔墨的重点却表现悲剧生活中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以悲剧反衬生活中的美。他注重的是在悲剧氛围中让人去感悟和反思,这样的艺术表现力更耐人寻味。最能体现以悲衬美这种关系的应该是小说《职业》。一个贫穷失学的孩子天天走街穿巷卖小吃,不停地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一群刚散学的孩子则尾随着他,模仿他的腔调大唱:“捏着鼻子吹洋

号!”。当这个孩子第一次摆脱叫卖者的身份,空着手从熟悉的街巷穿过时,禁不住兴致勃勃地喊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一个小孩子,他的生活是多么悲苦的了,可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保持着鲜活的童心。这个孩子的命运是悲的,而他的健康人性是美的。另外还有《七里茶坊》中的民工们,他们一年四季劳苦奔波,食不果腹。在风雪交加的寒冬之夜还在外面。作者没有用很大篇幅描写他们日子的艰辛,但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年月生活的清苦。然而坝上的人在大雪天辛苦赶羊,只是为了“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的人吃上一口肉!”多么朴素的一句话!多么让人感动和温暖的一句话!他们对所有的困难都没有怨言,因为要让别人过个好年是他们的心愿。《榆树》中的侉奶奶,她靠给人纳鞋底过日子,“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她勤劳善良本分,“大家都愿意找她纳,也不讲个价,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从这些下层人士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他们身上的人性美更加闪亮。作者就是这样,在平静的叙述中,在理性的笔触下,写着人们生活的悲苦,以及对人们的同情和悲悯,但更多的是表现生活和人性中美的一面。

汪曾祺小说中“和谐”与“悲剧意蕴”大致表现为共存、融合、反衬这样三种情形。这与传统文化、生活经历以及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汪曾祺小学五年级开始,随同祖父学《论语》并且隔天做一篇“义”来解释论语中的内容,受到了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他说他喜欢:“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喜欢“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充满人文气息的环境。所以汪曾祺的作品中,人物的欢乐是淡淡的,苦涩是淡淡的,他们顺其自然地活着。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中和”,所谓“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另外,“仁爱”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仁爱”使汪曾祺对芸芸众生带着关心和尊重。他在讴歌美好人性营造和谐氛围的同时,对人的不幸境遇也赋予了深刻的同情,这样他的文字又蕴藏着悲剧意蕴。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长大。但在抗战和文革中所经历的时代的动荡和生活的苦难使他变得成熟和谨慎,让他更加趋于中庸。于是他与众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样一个进退自如的境界。所以他的小说注重的不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不是大起大落,也不是对罪恶的声讨与控诉,他把人间的悲苦都嚼碎了咽

进肚里,而后缓缓化成一缕清淡却幽远的味道。在他构建的和谐世界里我们能够体味到淡淡的哀愁,而这种哀愁是美的,这种悲哀的意境也是美的。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另一位文学大家的影子,那就是沈从文。他笔下的世界尽管很美,人物尽管善良、勤劳,可他们总是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人们在看那个独特的美丽世界时,不免会看见文字里弥漫着的悲哀。沈从文曾说:“伟大而神圣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者是用微笑来表现的。”他确实是以冷静冲淡的笔墨去表现内心巨大的沉痛与悲哀的。汪曾祺是他的弟子,无形中不免也打下这样的烙印,但是他的情感更加内敛潜隐。他们师徒俩的创作可以说惊人的相似,但又各有各的味道。汪曾祺的作品即使写的是世态的炎凉,生活的拮据,一己能力的有限等生存之悲,也被微笑化解了,被温馨乐观消融了。

这样的美学风格也是具有其独特意义的。生活免不了会有苦痛、矛盾和无奈,如果只是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琐碎、烦恼、抗争,一切都那么沉重,那么悲哀,让人无法躲避,又无法改变,于是只剩下叹息和沮丧。而汪曾祺笔下被柔和化的生活,被微笑化解过的悲哀,读来就有了一层温馨的色彩。也许,这正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一切都看得开,在生活和理想之间能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于是活得自由自在,写得游刃有余,我们也可以看成这是他对于出世与入世的一种态度。和谐与悲剧的完美融合,使其作品闪烁着异样的光辉:从容,优雅,乐观,幽默,睿智,诗意,我们也从其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性格魅力的汪曾祺。

[参考文献]

- [1]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 [2]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M].上海三联书店,1991.
- [3]石杰.和谐:汪曾祺小说艺术的生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1).
- [4]摩罗.末世的温馨—汪曾祺小说创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6(5).
- [5]黄颂华.汪曾祺小说的悲剧意蕴[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3(4).
- [6]赖冈辉,郑曙红.汪曾祺研究述评[J].龙岩师专学报,1997(2).